



東亞文明：
傳統與變革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John K. Fairbank (費正清)

Edwin O. Reischauer (賴肖爾)

Albert M. Craig (A. M. 克雷格)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東亞文明： 傳統與變革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John K. Fairbank (費正清)
Edwin O. Reischauer (賴肖爾)
Albert M. Craig (A. M. 克雷格)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津)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王 华

封面设计：刘洪麟

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

[美]费正清 E·O赖肖尔 A·m克雷格 著
黎鸣、贾玉文、段勇、刘从德、保霁虹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32开本 34.25印张 3插页 767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201-01181-2/G·538

定 价：32.00元

译者前言

黎鸣执笔

在当今西方，从事东方、中国文化和文明研究的学者可以举出许多，但是其中最为著称者，恐怕无论如何不能不包括如下两位：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前一位是英国的生物学家、中国科技史家。他的七大卷《中国科技史》巨著无疑可以使他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占据无可非议的崇高地位。后一位则是美国当今研究中国问题的巨擘，是一位对于中国人文、历史研究成就卓著的专家。费正清教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中华民族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同情者、见证人，中国土地的很大一片领域中，都留有他的足迹。当今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很少不出自他的门下。令人痛感遗憾的是，费正清教授已于去年（1991）辞世，享年84岁。

费正清教授的著述，在中国已译成中文出版发行的，就我所知，已有数种，如《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各一版）。今

年我们又向读者献译两种：《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费正清自传》，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东亚文明》一书由费正清教授、赖肖尔博士（Edwin O. Reischauer）和克雷格博士（Albert M. Craig）三位合著。作者论及的东亚实指中国文化或其文明影响所及领域，其中主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四国。由此看来，《东亚文明》不啻是一部关于中国文明发生、成长、延拓、辐射的历程的记叙之著，而处于中国文明影响之下的日本、朝鲜、越南又不失其独特的民族性，所有这一切均通过作者们特有的西方人的视角加以考察、描述、评论，读来很有一种特异的新鲜感，并兼有某种令人欣慰的惊异感。这部近70万字的巨著，其主旨是从人类的角度去探索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一的东亚各国文明发展之历程，将其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予以揭示，这无疑对珍重和了解我们古国之文明，了解中国在人类社会的位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作者在“绪言”中说：“东亚必将进入人类共同命运的决定者行列。现在她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东亚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她的军事或经济方面的影响，这些只是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几个方面，重要的是东亚拥有一个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它不仅使东亚拥有一个伟大的过去，也使她为今天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中所涉及的史实，作者基本上是用公允的历史观点加以概括、分析、论述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书中对中国早期文化深厚之渊源予以盛赞，对传统的及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之利弊给予深刻的展示，对中、日、朝、越四国间政治及文化方面源远流长而密切相关的关系，以及面对外部世

界冲击的迥异态度进行清晰的透视和较客观的把握。一个有着种种痼疾但又不可取代的，愈来愈显示其魅力、其价值的东亚通过作者的描述递呈诸读者面前。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我想进一步说，阅读象费正清等这样睿智的西方学者撰写的东方史、中国史，不仅使人明智，且使人震惊，发人深思。当然，正如作者所说，西方史学家即使他在东亚生活多年，且对东亚史家之著引述颇丰，但最终仍是以局外人的姿态来编著东亚史的，这既有独到之点，又有不足之处。作者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有些论点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试举例如下，供读者参考。

书中写到鸦片战争部分，作者的看法偏于当时的英国方面。他们认为：“除香港商业基地之外，英国没有任何其它领土野心。攻击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亦不是他们的目的，除了广州人以外，这些百姓不过是战争的被动旁观者……。”这种论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意愿。

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叛国与南京伪政权时，作者说：“叛国者的统治，一方面也缓冲了侵略者残酷的高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并非是完全不爱国的。”这种说法，我们在情感上恐怕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汪精卫作为汉奸已被永远地钉上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柱，绝对不可能与“爱国”二字相提并论。

……

除上述几点外，自然还会有其他一些我们难以完全苟同的观点、描述，但我们应该说，从总体上看，作者们的观点是倾向于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前面已提到，费正清等教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尤其还应该看到，费正清教授更是一位以

治学严谨著称于世的历史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我们当然难以、也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观点去框正他的著作，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此除就作者与我们之间观点上的某些歧异提请读者注意外，基本上保证了原著的完整风貌，这样做是出于对作者和读者双方的尊重，我们自然更相信读者的良知。

参与《东亚文明》一书翻译工作的译者分工如下：

贾玉文：第1—9、16、19、20章（部分）、21、24—25、
28章

段勇：第14、15、17、18、22、23、26章

刘从德：第10、11、12、20章（部分）、27章

保霁虹：第13章

黎鸣：统稿、补译、改译、统一校正。

全书约70万字，译者们历时两年才全部翻译、审校完毕，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此书内容十分丰厚，时间纵深数千年，空间涉及中、日、朝、越四国，人物众多，事件浩繁，文字各异，翻译审校起来困难殊多，更限于译校者们学术修养不足，译文中舛错之处在所难免，为此，恳请读者不吝指教，以俟有机会再版及时补正。

此书在译校、编辑、出版过程之中深得王华女士惠助，李云霞女士亦为提供有关文献资料、查阅人名、地名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1992.1.20.

绪 言

对那些喜尚异国风情的人们来说，东亚的研究已不象过去那样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品。无论从我们了解人类遗产的广度方面还是从认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方面，东亚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西方人看来，东亚似乎处于广袤世界的遥远一端——因此才有“远东”这一古老的称呼。但纵观有文字可载的历史，人类的近三分之一在这里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的人民在组织、技术、财富等方面远比欧洲或其它文明区各民族先进和优越。现在的东亚正处在风云变幻之际，经济飞速发展，重大的政治问题纷至沓来。她包括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也是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以及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第三大经济强国日本。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世界的范围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在这种形势下，东亚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会相应地急剧膨胀。中国和日本已经以五大强国的两大成员的姿态与美国、苏联和西欧并驾齐驱。

东亚必将进入到人类共同命运的决定者行列。现在，她正

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极为重要的部分。30年代以前，在西方人的眼里，她一直被认作“远东”，被排除于世界事务之外。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相继发动了对日本、朝鲜、中国还有越南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他们是东亚的四个主要民族。越南战争从总体上改变了美国人关于东亚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概念。日本一跃而为美国海外最大的贸易伙伴，成为最令美国人在经济方面感到不安的国家。其他国家也感到了日本经济的影响，他们亦以困惑、销魂，甚至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中国。

当然，东亚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她的军事或经济方面的影响。这些只是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几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东亚拥有一个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它不仅使东亚拥有一个伟大的过去，也使她为今天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亚人的自我约束力和工作道德足以使加尔文主义及其献身教育的精神黯然失色，这些特征曾光耀一时，影响扩及世界。日本的经济和文化充满了无比的活力，它几乎未受到过任何令西方工业社会感到不安的社会问题的困扰。日本人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生活，他们在新与旧，传统与变革之间所取得的惊人的平衡是其它各工业大国望尘莫及的。与此同时，中国在现今世界中所显示出的不同的社会模式也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其社会组织的严密程度令其它国家难以与之匹敌。工业化国家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常被转化为加强其自身的一种特殊力量。中国社会组织模式的急剧转变已经使举世瞩目。

中日两国人民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方面均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但这些成就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如果

将政治分裂和战争破坏因素排除在外，这一点与朝鲜的形势极为相象。越南可谓灾难深重，但在各方面却能表现出相当大的弹性。东亚社会存在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黏着力和无与伦比的组织力。这些特征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当地各民族丰富的历史经验背后的深厚的历史传统。

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具有长期的在高度密集型社会中生活的经验。早在远古时代，东亚就已经出现了以栽种水稻为主的灌溉农业，水稻较世界其它地区种植的小麦、粟、玉米等无需灌溉的农作物产量要高得多，足可以养活那里众多的人口，至于牧业或乳业经济就更无法与之媲美了。这种农业在很早以前就要求发展乡村的劳动合作模式。东亚早在1,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繁华的大都市，但在世界其它地区，这样的都市尚未形成。可以说，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它各民族。拥挤的群落生活使他们养成了丰富的都市生活乃至民族群体生活的经验。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它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摩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在东亚，儒教不象欧洲基督教或亚洲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那样将超凡的宗教视为社会的核心，它所强调的是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并将其看成是社会的圭臬。儒家将严格的道德修养与高度的政治意识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从远古一直延续到近世的稳固的政治模式，这在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另一方面，由于儒教本身包含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所以在西方影响面前，它以世界上各种宗教未曾经历过的形式迅速地解体了。这样，便产生了对能够加快东亚变革的新文化形式的迫切需求。但即使在新文化形式制约之下，东亚伟大的传统中所蕴含

的卓越的政治技巧仍然是有目共睹的。

正当世界经历急剧变革，一切传统均遭到动摇之时，东亚文化的差异性向那些正在探索新模式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必由之路。东亚各民族在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技巧正在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东亚的文化成果也已取得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传统的东亚艺术在西方人的眼里仿佛是清新的、现代的。这同时证明了欧洲文化所具有的局限，即直到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才真正欣赏到东亚艺术的绝妙之处。从那时起，这种在几百年前产生于中国，现在又经日本人的重新阐释而传遍整个世界的东亚艺术精要便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在思想领域，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已直接向现代人发出了劝诫。禅是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的混合体，它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发展成熟，禅对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产生了极深的诱惑。中国诗歌的丰富想象，日本俳句的细腻柔美，中国近世小说的粗犷豪放，以及日本现代作家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这一切均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约占人类1/3的东亚人民在所有的领域中为人类创造出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使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之光。

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了解东亚？学习好比登山，至极顶的途径可能不止一条，每种途径都有其自身的利与弊。但可以肯定，以东亚人自然的认识方法来观察东亚是了解东亚的最便捷的途径之一。这个途径就是历史。在人类所有的大集团中，东亚人民最习惯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巨大贮存库，也是人类成就的度量衡。两千年来，坚持不懈地记载历史始终是他们认为高于一切的职责。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了政府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作

为旁观者，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得到有关东亚的最有意义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东亚。

该书基本上是一部历史著作。它试图通过中国、日本、朝鲜、越南这四个主要国家的历史来说明整个东亚。而对该地区边缘的各民族，如中亚的突厥人，蒙古人，西藏人，东南亚的泰国人，柬埔寨人，缅甸人，马来亚人，以及近代进入东亚的西方人等，仅做一些附加的描述。

正如我们已经定义过的那样，虽然东亚属于蒙古人种的居住区，但它从根本上说仍是一个文化单位。这种文化大部分是从古代的华北文化进化而来的。在该地区出现的文字制度，连同其道德观念，政治模式，社会形态，艺术倾向，文字形式及历史记载，这一切使东亚文化形成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分支。当然，这些文化因素经过时代的变迁也在中国各地区和其它3个国家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日本，甚至发生了向与中国政治社会标准截然相反的方向的转变，但她始终没有突破总体的文化模式。

中国是东亚文化的故乡，她的人口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3/4，因此她是我们所要叙述的第一个主题，也是最大的主题。当然我们也不会由此而忽略其它3个国家，特别是日本。在过去的100年中，日本在人口方面虽远不及中国，但她却首先在军事力量方面超过了中国，并在经济方面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首先研究中国在19世纪初期以前的历史，然后依次是位于其南部边疆的越南的历史，东北边疆的朝鲜的历史，最后是东方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历史。东亚各民族在19世纪初期以前的经历大部分未脱出传统的范围，这就是我们在该书标题中所

说的“传统”的含义。然后我们探讨了近代西方及其新技术对东亚造成的影响，以及东亚各国从19世纪开始至今，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所做出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变革”。四个国家的事件互有交叉。在中国之前，我们首先论述了日本的反应，因为她反应比较敏锐，结果也比较成功。对于越南和朝鲜则一带而过，因为她们均丧失了独立，为法兰西帝国和日本帝国所吞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重新以独立政权的形式出现。

通篇我们对四国间的相互作用给与了特殊的注意。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和语言区域当中，越南和朝鲜堪称为中国模式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异形式。日本提供的模式与前者具有强烈的反差，充分显示了东亚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特别强调了四国之间，四国与西方及其它非西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使我们在这两条发展路线了解得更加明晰了。我们不是以偏狭的眼光来看待东亚的，而是将其视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范例，人类前途的一个主要模式。

Ⅴii

我们对东亚历史的研究已进行了几十个春秋，在此期间，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人民均经历了战争和入侵的巨大灾难，取得了民族的生存和新生。目前的形势很复杂，很难简单地加以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已非美国人所能预测，而和平对越南也是姗姗来迟。但无论如何，这几个国家现在均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她们的人民都会认识到，过去终不过是充满希望的未来的前奏。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既不想纠缠于繁缛的现时，也无意预言未来。我们只强调了解历史是认识现状，判定未来的基本方法。历史的意义即在于变革，它也许是看似无意义的，甚至是

被人们严重误解的。

历史是我们认识东亚的捷径，但我们都懂得，历史不存在有任何终极的标准。那种忽略有碍于自己行为的史实、束缚于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或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不充分的。当然，现实主义的历史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东亚，那里的极重视历史的文明已经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宏富的史料，历史学家必须对所需要的资料和概念进行细致地选择，并决定如何系统地组织这些资料和概念。在做出成千上万种小的决策的同时，历史学家本人已经完全融入到他的写作之中了。历史学家的成果可以说是他思想的结晶，他的同龄人，他的时代，他的国家及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这些不同的因素，按照历史学家所共同遵循的原则加以系统地组织，一部特征鲜明的历史著作便完成了。

如果由一位中国人，日本人，或朝鲜人，越南人来编写东亚近代史，那么他的作品一定会与出自西方作者之手的历史大相径庭。东亚的史学家是从东亚文化内部的角度来论述东亚历史的，作者本身已经参与到他所描述的史实当中，故不可能不受某些因素的制约。而西方的史学家，即使他在东亚生活多年，且对东亚史家之著述引述颇丰，但最终他仍是以“局外人”的姿态来编著东亚历史的。这种情况既有独到之点，也有不足之处。

事实上，从局外人的角度所编著的历史并不见得更客观。西方史学家是从其自己的文化角度来编写历史的，故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譬如，西方所谓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与亚洲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当由西方人来认识自由、人权，个人主义或民主的时候，他不仅认为它们是现代的标志，同时

也视之为传统的产物，即希腊思想，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卢梭（Luther）的主题，伦勃朗（Rembrandt）绘画所表现的个性思想及洛克（Locke），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思想的延伸。这种思想的连续性常常使什么是现代的或什么不是现代的问题混淆不清，以致人们轻而易举地便可以接受现代事物，而摒弃传统则难上加难，或认为根本无此必要。

XViii

在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引进现代思想的阻力也非常之大。西方的所谓自由或个人主义观念在东亚的传统中缺少共鸣，故想要在东亚发展现代西方观念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接踵而来的文化上的断层同时也是精神作用的结果，它的影响有时相当之深远。对文化断层的体验，使得东亚的史学家对文化的本质比他们的西方同行了解得更加清晰、彻底。但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另外两种倾向，一方面过分自觉地将无论是现代西方的影响还是过去的传统一并摒弃掉，另一方面则是迫不及待地完全接受西方思想，或赋与传统以新的形式，或将两者巧妙地合而为一。

民族的观念也同样影响了历史学家的工作。以美国为例，尽管她的文化发源于欧洲，但在这块新大陆上，她完全是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形势使得文化中的某些激进因素从一开始就明显多于欧洲。新英格兰激进的新教思想扩散传播，逐渐失去了本身的宗教意义，而演变为政治上的民主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友会的聚会所已经成了市民的集会地。另一方面是在宪法中突出强调的18世纪启蒙思想，在科学，理性和自然的旗帜下与欧洲保守的宗教传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块空阔无垠的土地使美国人大受裨益。他们发展启蒙思想，创立了一个“新

国家”，那些曾经阻碍欧洲现代民主思想发展的乡村制度、贵族、占有土地的教堂，以及各种保守的习惯势力在这里均已销声匿迹。传统社会秩序与现代化之间的斗争非常缓和，使得美国人的经历与欧洲人或东亚人迥然不同，相比之下，欧洲和东亚传统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

姑且不论其激进的遗产如何，作为最古老的，特别是地理条件相当优越的新国家，美国迟早会走向相当保守的一边。开放的边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几次工业革命的丰硕成果，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她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形态，社会财富和权力。这必然会导致如下的结局，在世界范围内，她不仅需要与其它稳定的民主国家结盟，也要与新传统主义的（neo-traditionalist）专制政体联合——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直接反对颠覆现时世界的联盟。

美国人是从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东亚的，他们很容易从自己所谓的激进或保守观念出发错误地认识东亚。美国人的使命感——创造新型社会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种副产品——诱使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东亚社会。我们赞成反传统的民主改革。尽管立宪政府在东亚与在美国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当它出现在历史的帷幕上的时候，我们也无不为之欢呼雀跃。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属于最古老的新国家，拥有长期的现代思想实践经验，所以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所体验的现代观念及现代制度是有确实根据的。东亚人应用同样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则似乎是一种“歪曲”。这种认识有时会因为某些东亚史学家的著作而得到进一步地加强，他们利用从西方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模式，常常将自己的历史视为“被歪曲”的历史。

另一方面，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分加给东亚历史，这种倾向是与另一种使我们怀疑革命性变革的保守倾向相伴而生的，这种发生在20世纪的变革采取了与我们18世纪的革命截然不同的形式，即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当然（历史著述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我们会不断地做出努力，既不会批判东亚的传统，也不想批评现代的革命。但“谬误”仍然是难免的，因为我们或许站到了东亚那些激烈反传统人们的对立面，或者忽略了某些革命的阴暗面。总而言之，无论历史学家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无论他对自己的观点做什么样的补充，他总会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以与其国家利益相关的形式来编写历史。）

此外，还有我们的时代观念问题。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念正在不断地进步，经济飞速发展，个人的福利状况日趋好转。所以在编著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东亚各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上面。我们将用很大的篇幅来反映我们的观点，或至少反映我们对东亚重要意义的认识。但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社会生态学的兴起，总体发展的概念问题逐渐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现在，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所谓的经济零增长理论。和美国、苏联及欧洲一样，日本也在高价消耗石油及各种原材料。东亚和世界究竟能容纳多少个成功的开发者？新原料资源会永久地供过于求吗？很明显，未来的“发展”观与过去的发展观是迥然不同的。（从根本上说，未来历史学家可能会把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到日本和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方面，而不是它们的工业发展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俄、日的发展可能被视为浪费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历史观也重覆前辙，必将会出现某些变革。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为了更准确地理解东亚，我们必须首